

贫困的形成机理：一个分析框架的探讨^{*}

胡 联^{1,2}，孙永生³，王 娜¹，倪国华¹

(1.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2.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 233041；

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贫困的形成机理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目前，关于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还没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首先回顾贫困形成机理的理论研究现状，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然后本文结合中国反贫困的实践经验，提出一个贫困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分析贫困的各致贫因素：经济因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地理环境因素、脆弱性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以及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最后本文做出了总结。

关键词：贫困；形成机理；分析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个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长期存在的问题。20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与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生产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贫困的范围与规模不断缩小。但是，贫困问题并没有消除，国家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化正在加剧，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世界范围的贫困仍十分严重，并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甚至成为社会矛盾与动荡的根源。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也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但目前，关于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还没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已有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从某个角度诠释了贫困的成因，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贫困形成原因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问题，尤其是在多维贫困的视角下，贫困的形成机理将更加复杂。如果仅仅从单一角度出发，很容易就同一个问题形成迥然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科学的揭示所有的致贫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从而提高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以中国反贫困实践为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活在1天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至少减少了5亿，贫困发生率从1979年的63%下降到2009年的10.7%。但当

前，中国农村贫困的性质与特点已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其贫困分布已从改革开放初的整体性贫困向区域性贫困（尤其是老区、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贫困）过渡，200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中的65.9%分布在西部地区。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反贫困实践，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贫困发生机理的研究。本文从贫困的形成机理理论研究现状入手，结合实际经验，试图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揭示各致贫因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对贫困形成机理的统一框架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二、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现状

贫困这种普遍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成因。其原因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还有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

（一）经济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贫困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很多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贫困的形成机理。1956年，纳尔逊根据人均资本、人口、国民收入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提出了贫困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从资本供给方面看，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水平和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导致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引起低经济增长率和新一轮低收入。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

作者简介：胡联（1978-），男，瑶族，湖南怀化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可持续发展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孙永生（1978-），男，安徽阜南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修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王娜（1984-），女，辽宁盘锦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经济；倪国华（1977-），男，内蒙赤峰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0ZD&025）的阶段性成果

恶性循环。从资本需求方面看，也类似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积累”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穷日趋加剧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很低，导致居民生活水平低下，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导致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产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又引起产出增长停滞甚至下降，最终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产出导致新一轮的低收入，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此外还有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杨小凯的分工和交易说等等。

（二）社会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社会学对贫困的研究也是一个活跃的领域，它主要从社会视角寻找贫困的原因。例如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而是源于人口生产规律。他认为贫民自身是贫困的原因，与社会制度无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者们注意到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布劳-邓肯模型”为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的分析框架。这一模型可以反映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对子女后来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Rowntree (1901) 发现，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生贫穷的可能性并不相同，尤其在儿童、父母、老年等三阶段，特别容易落入贫穷。贝克尔和托姆斯认为，贫富差距可能会在代际间形成一种传递机制。阿玛蒂亚·森 (1999) 提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

（三）文化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贫困文化论是20世纪60年代由奥斯卡·刘易斯创立的，这一理论强调父母养育方式与社区生活对孩子的影响。他从全社会角度、社区层次、家庭层次和个人层次等四个方面说明贫困文化对穷人的影响。“贫困文化论”解决的问题是贫困是如何在穷人之间传递的。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刘易斯认为，仅靠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是解决不了穷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消灭贫困文化，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他们产生内在的动力、产生劳动积极性。

（四）制度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早期的制度贫困研究可追溯到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核心观点：即制度造成贫困。缪尔达尔 (1994)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原因，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托达罗认为，贫困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问题并不是自然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如果增加的国民收入可以在人们中广泛分配的话，那么它多多少少要依赖于

经济增长的特点和政治及制度的安排。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当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有效制度的短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是“制度性落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是“制度性贫穷”。

（五）地理环境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这也是最为传统的贫困成因解释。贫困处境论是以查理斯·瓦伦丁、海曼罗德曼等一批社会学家提出的。Elissaios Papyrakis 和 Reyer Gerlagh (2004) 利用美国1986—2001年期间49个州的截面数据，考察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对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主要通过降低投资、对外开放度、科研教育水平和增加贪污腐败等机制影响美国地区经济增长。此外，由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导致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自然灾害的频发，而造成人们基本生活与生产条件可视为基本生存权利被剥夺的贫困现象。这类贫困，有的学者称之为“气候贫困”。Stone M P (2006)、胡鞍钢 (2009)、程静 (2010) 都对此进行了研究。

（六）个体视角的贫困形成机理

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这就是所谓的“贫困而有效率”的著名命题。舒尔茨认为增加农户的知识，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消除贫困。反之，农民的人力资本低会导致农民的贫困。国内学者李守经 (2000)、韩劲 (2006)、岳希明 (2007) 等认为地区的人口素质低下、观念落后导致了贫困。贫困人口素质低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低，掌握的知识量少，使得他们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 (沈红, 2000)，同时也影响他们非农就业的机会。对于这种由知识缺乏造成的贫困，胡鞍钢等 (2001) 称之为“知识贫困 (knowledge poverty)”。

除以上所提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如 Ahmed、Lipton (1999)、Chaudhuri et al (2002) 等开始关注贫困脆弱性，即现在非贫困人口可能由于某种风险打击在将来陷入贫困状态。现在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可能只是短期的贫困而在将来脱贫或者在将来继续贫困。贫困脆弱性来自于经济、社会、自然、政治等多种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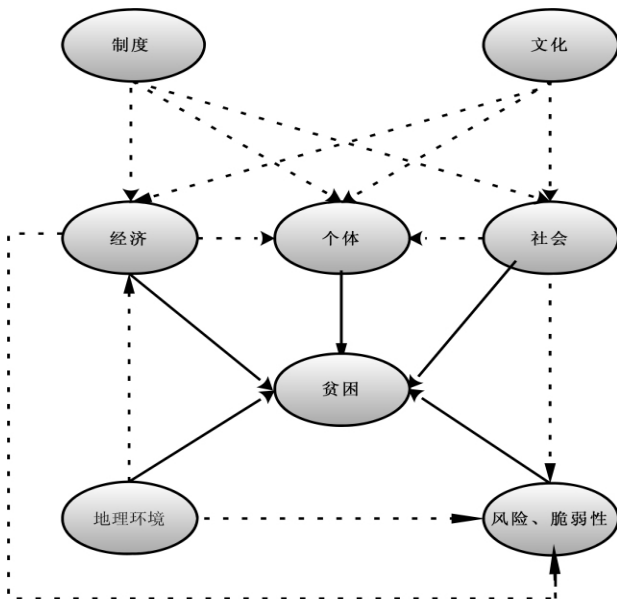
纵观国内外学者就贫困发生机理的研究，已有丰富的理论成果，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依然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目前关于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还没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已有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从某个角度诠释了贫困的成因，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贫困形成原因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第二，现有对贫困形成机理的研究围绕着贫困个体内在能力缺乏和外获

得、运用能力机会的缺失这两条主线。也就是说，现行的理论体系大都是把人作为“个体”来研究和对待，而缺乏从区域和人群的构成这个角度来研究贫困的形成机理。第三，贫困发生机理的研究对于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气候变化与其它致贫因素的相互关系研究尚不足。

三、一个分析框架的探讨

在梳理贫困的形成机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贫困的形成机理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在这个模型中，导致贫困形成的因素分为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直接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和脆弱性因素。间接因素包括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这也就是说，经济因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和脆弱性因素直接导致了贫困的形成，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通过直接因素的作用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模型中的实线箭头表示的是直接作用，虚线箭头表示的是间接作用。

贫困的形成机理分析框架



在这个模型中，贫困是指除收入外，包括教育、医疗、营养等内容多维贫困。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理论的主要创始者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森（Sen, 1999）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经济因素包括包括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包括教育、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数量等内容。社会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等方面内容。个体因素包括个人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精神面貌等内容。地理环境因素包括贫困地区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内

容。脆弱性因素指有由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造成的在将来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的福利低于预定水平的可能性。制度因素包括经济和社会制度。文化因素特指贫困地区的文化。

从导致贫困形成的直接因素来看，首先是经济因素，无论是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理论，还是分工和交易说，都从不同的经济视角阐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将导致贫困的产生。除此之外，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即不同产业发展程度都贫困的形成也有着影响（Ravallion, 2007在《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分析了不同产业发展对贫困减少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经济角度讨论贫困的形成的理论成果非常丰富。经济因素与其它致贫因素存在以下关系：首先，经济因素会通过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该地区的公共支出，进而影响当地的教育水平和医疗、社会保障状况，最终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状况（也即个体因素）。其次，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状况会对其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最后，经济因素也会受到制度因素和当地文化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也是脆弱性因素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现有的理论和后面的论证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从社会因素来看，以维斯·莫尔为代表社会分层职能理论，贫困结构论、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都从社会的角度说明了贫困的形成过程。社会分层职能理论试图从宏观上构架不平等存在以及贫困存在有利于社会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贫困问题研究中，出现了消除“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的观念。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界将社会政策目标从“克服贫困”转变到了“消除社会排斥”上，这一转变就将贫困问题的解决从表象转向了根本。社会因素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社会因素与其它致贫因素存在以下关系：首先，社会因素影响个体因素：由于社会排斥以及收入代际转移机理的作用，一部分人口难以获得足够机会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医疗方面）。其次，社会因素收到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各国很多实践都证明，一个地区的制度和文化的对这个地区的社会将产生重要影响。最后，社会因素是脆弱性因素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个体因素来看，指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如：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精神面貌等将导致贫困的形成。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这就是所谓的“贫困而有效率”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农民之所以贫穷是由于缺乏知识和高质量的投入，只要增加农户的知识，并有效使用“较好”技术的知识，引进现代农业的高质量投入，便可望打破传统内部均衡和停

滞条件，从而带来更高产量，消除贫困。舒尔茨认为增加农户的知识，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消除贫困。反之，农民的人力资本低会导致农民的贫困。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不仅受到当地制度、文化因素影响，还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影响（如教育观念、教育水平、医疗状况等等）。

第四，从地理环境因素来看，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贫困，贫困被定义为生存空间不足。这种观点认为贫困由于贫困者所居住的环境恶劣等原因引起的，比如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水资源缺乏、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落后等引起人们生存生活的困难，从而导致收入低而且支出相对又高，最终无法摆脱贫困。Prebisch（1964）、Singer（1950）等人首先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揭示了资源诅咒现象。目前，我国反贫困的主战场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等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区，也说明了地理环境因素对贫困形成的重要影响。当然从各因素互相作用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状况同样有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无论是经济发展理论和各国发展实践都有很多的证明。

第五，从脆弱性因素来看，一些学者如 Ahmed、Lipton（1999）、Chaudhuri et al（2002）等开始关注贫困脆弱性，即现在非贫困的人口可能由于某种风险打击在将来陷入贫困状态。现在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可能只是短期的贫困而在将来脱贫或者在将来继续贫困。贫困脆弱性来自于经济、社会、自然等多种方面。近年来，风险和脆弱性重新受到关注。脆弱性不仅是贫困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是造成贫困和赤贫的原因。有证据表明脆弱性对人的营养和收入都有持久的影响。从脆弱性的角度看待贫困的形成，我们可以更好的分析贫困形成的动态性。

从导致贫困形成的间接因素来看，首先从制度角度来看，制度性贫困论认为任何一种贫困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资本短缺、资源贫乏、人口失控以及科技文化落后等之所以形成的原因，都可以在制度分析中找到答案。即制度贫困制度落后和制度短缺，是一切贫困形成的总根源。由于制度的内涵很广泛，本文把制度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通过影响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对个人（人力资本形成及发展机会获得）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贫困的形成。Mark Robert Rank 认为贫困根源于制度，因此消除贫困需考虑更广泛的制度层面的解决措施。Brady David 从宏观的制度层面着手，指出左翼政治制度的力量对贫困有强大的负面影响。国内学者，黄少安（2003）提出，中国农民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是不合理的制度决定了农民贫困、制约了农民致富。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费制度、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是导致农民贫困或不

能致富的主要因素。胡鞍钢认为，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这种长期实行的不公平、不公正制度本身就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贫困文化论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从而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一旦此种“亚文化”形成，就会对周围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代际传递。由于文化作用非常大，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个体的生活方式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贫困文化正是通过这些途径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张纯元（1996）调查结果表明几乎 23 个贫困县都长期封闭，普遍存在“缺乏主动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保守思想严重，商品经济观念淡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陈浩等（2001）认为农村贫困地区无不表现为精神贫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文化特点（比如宗教消费、价值观等），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个体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进而促进了当地贫困的形成。

综上所述，经济因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和脆弱性因素将会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通过直接因素的作用间接导致贫困的形成。制度因素通过经济因素、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导致贫困。文化因素通过经济因素、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导致贫困。在导致贫困形成的直接因素中，各要素也存在着相互作用。首先，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地理环境因素将导致个体的脆弱性，进而形成贫困。其次，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也会作用于个体作用。第三，地理环境因素也将作用于经济因素。

四、总结

以上是对贫困形成机理的统一框架进行的初步探讨，阐明了各致贫因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对于贫困的形成机理，目前理论界多是从不同角度的分析，还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分析框架。本文通过总结现有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一个贫困形成机理分析框架，试图更科学的揭示所有的致贫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从而提高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当然鉴于贫困形成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一分析框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它需要在进一步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完善。

参考文献：

[1] Araujo, M. Caridad, Ferreira, Francisco, Lanjouw, Peter, Ozler, Berk, "Local inequality and project choic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Ecuad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2008): 1022 – 1046.

[2] ALCOCK, P, Understanding Povert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3] Auty, R. M.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Bardhan, Pradan, Mookherjee, Dilip, "Decentralizing antipoverty program delive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2005): 675 – 704.

[5] Bernstein, Thomas, Lu, Xiaobo, .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3.

[6] Cai Fang, Wang Meiyun, .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n Unlimited Surplus Labor in Rural China". China&World Economy, 16 (2008): 51 – 65.

[7] Camelia Minoiu, Sanjay G Reddy, "Chinese Povert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lternative Assumption".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4 (2008): 572 – 596.

[8] Chambers, D. , W. Ying, Y. Hong, "The Impact of Past Growth on Poverty in Chinese Provinc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 (2008): 348 – 357.

[9] Chase, Robert, . Supporting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the impact of the Armenian Social Investment Fund.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6 (2): 219 – 240, 2002.

[10] Conning, Jonathan, Kevane, Michael, . Community – based targeting mechanisms for social safety nets: a critical review. World Development 30: 375 – 394, (2002).

[11] Dahrendorf, R, life changes: Approache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2] Little P D, Stone M P, Mogues Tewoda, j et al, "Moving in Place": Drought and Poverty Dynamics in South Wollo, Ethiopi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 (2006): 200 – 225.

[13] 纳克斯. 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 [M]. 商务印书馆, 1966.

[14] 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等. 发展经济学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5] 缪尔达尔. 世界贫困的挑战 [M].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4.

[16] 马尔萨斯. 人口论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7] Strobel, P. . From Poverty to Exclusion: A Wage Earning Society to a Society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48, 173 – 189, 1996.

[18] Rowntree, M,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don, Macmillan, 1901.

[19] McLanhan, S. S. & Booth, K, Mother – only families: Problem, prospects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557 – 580. 1989.

[20]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1] 刘易斯. 贫困文化论 [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22] 黄少安. 制约农民致富的制度分析 [J]. 学术月刊, 2003, (6) .

[23] Singer, H. W. The Distribution of Trade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 (5): 56 – 58, 1950.

[24] 胡鞍钢. 亟须关注气候贫困人口 [J]. 中国减灾, 2009, (6) .

[25] 程静. 农业天气风险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 [J]. 地域研究和开发, 2010, (8) .

[26] 韩劲. 走出贫困循环, 中国贫困山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对策 [M].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27] 岳希明, 李实, 王萍萍, 关冰. 透视中国农村贫困 [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28] 胡鞍钢, 李春波. 新世纪的新贫困: 知识贫困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3) .

[29] Ethan Ligon and Laura Schechter,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3 (March) C 95 – C 102 2003.

[30] Christiaensen L, and K. Suhharqo,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vulnerability in rural Keny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Photopaper 2001.

[31] Jamal Haroon,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Evidence from Pakistan, Report No. 80, 2009.

[32]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1 [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编辑校对: 韦群跃 孙黎波)